

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理论、政策与实践*

——两刊第五届“三农”论坛会议综述

王文隆 夏显力 张 寒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处在“十四五”及“第二个百年目标”开篇之际，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为深入研究新时代“三农”理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年11月13日，由《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主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两刊第五届“三农论坛”征文研讨会在陕西杨凌隆重召开。论坛共收到全国各地投稿515篇，经过两轮校内匿名评审和两轮校外匿名评审，最终确定72篇论文入选参加论坛交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广州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全国几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入选论文作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围绕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本、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农村金融与数字农业、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新发展格局与农业转型、生态治理与农业绿色发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设置了十二个分会场，与会专家学者和论文作者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观点。现将本次论坛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而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

*夏显力为本文通讯作者。

必经之路。乡村振兴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而且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从微观生产要素的视角，论文作者关注了工商资本下乡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的影响。例如，李秀萍和韩叙剖析了工商资本下乡的作用，从直接渠道（农业规模化经营）与间接渠道（农业社会化服务）两条路径，分析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他们建议在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可能造成的对贫困户利益的侵蚀，造成贫富分化。从信息技术的视角，刘子玉和罗明忠指出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民幸福感，使用互联网的农民主观幸福感平均提高 0.156 个单位，客观幸福感平均提高 0.210 个单位。互联网使用通过阶层认同提升了农民幸福感。

从宏观产业层面来看，促进农民增收是实现产业兴旺并达到乡村振兴总目标的首要任务，涉农产业作为结合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链融合体系，与农民收入关系密切。严斌剑等发现，涉农产业通过带动农民平均工资水平和农民经营性收入，从而进一步带动农民纯收入增加。农业生产托管，一方面通过规模经营带动了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有力促进了农户节本增收。张恒等研究发现，相对于农户自我经营，农业生产托管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显著增加农民收入。

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许佳彬和李翠霞指出，中国奶牛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表现为“两质、两效、两绿色、两安全”，发展逻辑遵循“战略导向——三产融合——三链同构——绿色引领——开放合作”。与奶牛养殖业不同，林业产业转型升级依靠互联网的跨界融合。龚伟昕等基于天猫商城数据分析了林产品网络口碑的临界效应，认为商品真实性、服务水平、物流水平等不同维度的网络口碑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临界值时，会显著促进林产品销量增长。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考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和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问题。为了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曾莹和杨丹以养猪业饲料添加剂应用技术为例，分析了绿色技术对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他们提出，通过推广绿色饲料添加剂并构建基于保险和产业链的风险分担机制，能够降低技术转换成本，实现养殖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了降低灾害发生后的负面影响，张瑞龙等通过分析整体外部干预在自然灾害与蔬菜批发价格两者关系中的作用，提出应该增强政策监管性，使之有效落地，减少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对叶菜种植户给予适当补贴。

农民工回流可以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张欢和吴方卫分析了制造业产业转型后，收入与幸福感对农民工回流的作用机制。农民工回流到中西部地区受收入与幸福感双重驱动，但幸福感的影响大于收入。

三、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

在 2020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市就业的补充力量，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刘超研究了城市包容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城市包容度可通过创业、工资收入以及工作搜寻成本三个影响渠道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产生正向影响。针对随迁进城是否让农村父母的生活更美好的问题，纪鸿超发现，农村中老年人进城显著地改善了其生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

户籍门槛是吸引还是阻碍劳动力流入？针对这一问题，钱文荣等解释了户籍门槛对劳动力流动的双向作用。户籍门槛扭曲了劳动力流动决策，一方面，户籍门槛作为流入备选城市福利提升的信号，增加了劳动力的预期效用水平并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另一方面，户籍门槛直接反映了落户难度并对劳动力流入产生负向影响。王大哲实证研究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村流动人口城镇相对贫困和同群体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农村流动人口陷入城镇居民相对贫困和同群体相对贫困的概率将分别降低10.5%和10.2%。

分类推进乡村振兴，重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已然成为了研究热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分类推进的必然结果，而村民意愿关系着推进成效。张会吉等指出，提升“产业兴旺”满意度会显著提高村民内调型空间重构意愿，提高“生态宜居”满意度会显著降低村民的空间重构意愿，而提高“治理有效”满意度则会增强村民对聚落空间重构的信心和意愿。

四、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本

随着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平台经济的兴起，技术、信息等要素成为农村发展实现新突破的核心。周凤和邓宏图研究发现，互联网应用在农村并未处于“生产率悖论”阶段。对于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的农村而言，推动互联网的多元化应用，进一步实现信息、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优化配置是当前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信息技术是促进非农就业的有效手段。方兰等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提高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风险偏好程度来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李凡略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其非农就业质量。此外，张威和张卫国提出，农民使用普通话可以增加社会网络、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和缓解正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创业行为。

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户籍制度下不同类型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差异。盖庆恩等关注了不同类型劳动力经验回报率的差异，通过综合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人口普查数据等估计了中国整体和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存量，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进行增长核算和发展核算，提出了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激发农村经营制度活力，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然而，权属模糊的农地产权制度成为制约农户资源配置、阻碍收入增长的障碍之一。周南等从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视角出发，以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土地确权

的增收效应，指出注重农户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的提高，对于巩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论坛还探讨了影响农地流转的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因素。例如，樊鹏飞和冯淑怡研究发现，上级政府实施的农地流转目标考核促进了村庄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农地流转数量，也提升了农地流转质量。二是市场因素。例如，针对中国农地流转市场中存在大量市场化程度偏低的熟人交易现象，陈甲等研究发现，由于声誉机制约束和搜寻成本不同，转出户与本村转入方交易时的租金显著低于外村转入方。

论坛还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宅基地问题。一是宅基地退出的阻碍因素。例如，张慧利和夏显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心理所有权抑制了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他们建议构建自上而下的“国家+村集体”协同型宅基地产权治理体系，推进制度联合改革，增强农户的社会融入能力。晋洪涛等基于“非正式制度嵌入性”理论，从农户分化与代际剥削双重视角探究了农户不愿退出宅基地的根源。二是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农地承包权退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王静和赵凯基于农户行为理论，指出宅基地退出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农地规模缩减和农户非农就业对其农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产生间接正向影响。

六、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

关于粮食安全问题，论坛主要从耕地“非粮化”和种植意愿的代际差异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首先，受种粮比较收益较低影响，耕地“非粮化”对保障粮食安全带来了一定挑战。刘余指出，耕地“非粮化”的出现导致周边流转用于粮食经营的地块价格明显上涨。其次，农户的种植意愿存在代际差异，而这种代际差异又会对农户当前的化肥施用量产生影响。唐林研究发现，若父辈或者子辈未来有种植意愿，则农户会选择在当期减少化肥施用量，而且子辈的种植意愿能够进一步强化父辈对化肥施用量的负向影响。

家庭农场对小农户的有效带动有助于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李艳等考察了信息技术应用对家庭农场社会带动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他们指出，应着重指导家庭农场强化生产技术相关信息的应用，提高家庭农场农业经营收入，从而促进其发挥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机制。杨青等从农机购置补贴视角，探讨了小农户社会化服务问题。他们建议，应健全补贴机制，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的作用，并积极消除禀赋约束的不利影响，提升小农户社会化服务的可获得性，从而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七、农村金融与数字农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和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村金融愈发活跃。论坛对民间放贷和数字金融两个方面开展了研究。一是在民间放贷方面，杨少雄等基于合约、借方和贷方三个特征设计农户民间放贷离散选择实验，构建效用相互依赖模型分析农户民间放贷选择偏好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农户民间放贷选择表现出经济理性与道义理性双重偏好。二是在数字金融方面，张龙耀等从信息可及

性与信息使用两个维度构建数字鸿沟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不仅降低农户数字金融的响应概率，而且降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广度。

论坛还从农产品电商、农户数字素养和数字乡村等方面对数字农业展开了研究。一是农产品电商方面，小农户连接大市场的电商逻辑并未在既有研究中形成共识性结论。马九杰研究发现，在农产品电商供应链“最初一公里”中，代办制通过非正式契约的形式嵌入小农户与电商企业之间，能够弥补双方协调能力的劣势，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最终保障交易的顺利完成。二是农户数字素养方面，李晓静等从信息和数据、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建、数字安全、问题解决五个维度构建农户数字素养体系。研究发现，数字素养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农户自身的创业行为，也能发挥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三是数字乡村方面，彭艳玲等从数字经济参与的社会效应视角开展研究，发现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物流、数字化金融及数字经济整体参与可显著提升农户社会阶层认同，数字化营销参与则显著降低农户社会阶层认同。

八、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推动乡村振兴。基于理论溯源和实践特色，蒋国安发现，乡村振兴战略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城乡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纪志耿和罗倩倩指出，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共同体理论、生态批判理论、精神生产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土地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乡村共同富裕之路的集中阐释与表达。

除了上述理论层面的探讨外，论坛还对产业发展、集体资产改革和法治建设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一是产业发展方面。郝政等从创业生态系统组态视角，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乡村产业振兴质量的影响，揭示了高产业兴旺度的多重实现路径。乡村旅游合作社是联结乡村发展和旅游产业的有效载体。高强等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乡村旅游合作社要均衡外来资本与村社资源的地位，优化两类成员之间动态竞合关系，并基于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特征，构建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二是集体资产改革方面。沈金龙等研究发现，为了明晰集体资产分配，保障农民权利不受损失，在集体资产改革推进中，农户行为响应经历了“认知——意愿——行为”的过程，而农户认知是影响农户行为响应机制的关键。三是法治建设方面。洪翠对韩国乡村振兴法律体系及其各领域法制实践的成效及经验进行简要概述，指出我国乡村振兴法律体系的构建应当在《乡村振兴促进法》这一基本法“总”的规划引领之下，从“分”的角度围绕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总方针设计立法内容，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乡村振兴法律体系。

九、新发展格局与农业转型

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趋缓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区已成为中国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引擎和充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途径。然而，曾华盛和徐金海研究发现，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在企业进入效应和需求效应的作用下降低了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从条款深度来看，以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取消为重点的浅层条款加速了农产品出口质量的下降，而以投资政策、技术合作等为重点的深层条款在投资促进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作用下更有利于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

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关乎农产品生产源头的质量，产品质量认证的推行能否加快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陈哲等在使用有限混合模型测度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程度的基础上，检验了产品质量认证对猕猴桃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从绿色低碳转型引导政策优化的角度，李琪和李凯指出应以开展绿色生产托管、推动绿色农产品认证与销售融合等为重点，有的放矢地为农户提供支持政策。在农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同步进行。齐莹和颜廷武分析了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情况，探讨了责任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十、生态治理与农业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是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重要抓手。论坛主要从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农户层面展开研究。

在宏观政策层面，针对横向补偿制度能否推动生态高质量发展问题，田蓬鹏和朱玉春以前期试点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的渭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发现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通过提高生态可持续性、公平分配、环境治理效率对生态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低碳农业作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合理的环境规制有效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农业碳补偿率。伍国勇等利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的两个变量环保投资强度和碳排放交易规制强度对农业碳补偿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在微观农户层面，论坛主要从农户家庭、农户收入和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等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农户家庭方面。李晗和陆迁以发展韧性为切入点，研究发现气候变化降低了农户家庭发展韧性，该负面作用同时来源于家庭向上流动趋势的下降与下行风险的升高。二是农户收入方面。吴健等研究发现，退耕还湿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时间推移，退耕还湿对居民收入和生态旅游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三是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方面。周力等研究发现，手册干预、短信干预和二者联合干预方式对农户采纳降镉技术并无显著影响，但具体到单独的降镉技术，部分干预反而显著降低了技术采纳概率。信息摩擦可能是导致信息干预失效甚至负向作用的主要原因。

十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产业扶贫作为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脱贫户持续增收的重要手段。白永秀等指出，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增加贫困户生产经营性支出以及鼓励贫困户务工是产业扶贫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开展返贫防范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亟需科学精确的理论依据和行之有效的实践指导。为此，周迪等研究发现，内生动力要素是返贫风险测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应加强返贫风险科学识别，有针对性地完善内外部动态防范及双重

帮扶机制。

在总体健康水平不高的背景下，健康不平等问题日益突显，从而导致农村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更低，这已成为居民致贫返贫的主要风险。张全红和李博研究发现，早年贫困经历及其持续阶段对个体成年后的健康指标均产生负面影响，即使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向上的社会流动也难以抵消早年贫困对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周彩和高鹏探讨了乡村精英治理中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发现大学生村官对村落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张皓乙等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时间对学业表现的影响呈倒U型；父母教养方式在农村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时间和学业表现上具有调节效应。

十二、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标志着我国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围绕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问题，论坛主要从乡村自治、农村疫情防控、农村互助养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区域公用品牌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使村民自觉参与环境保护成为一道治理难题，社会动员如何促成村民的自觉行动？赵焱鑫以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为例，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典型案例资料进行逐级编码，研究发现，项目发包是社会动员的触发机制，基层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刺激乡村自治系统的运作，乡村自治系统不断推动并促成了村民自我意识的建构，从而将环境保护行为内化为共识。

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薄弱，外出务工返乡人员流动性大，疫情防控是重点也是难点。计芳芳等利用过程追踪方法，研究发现，农村基层组织在进行疫情防控时会受到行政命令、道德规范、监督激励、外在期待等制度性要素的影响。

通过社区治理实现农村社区组织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背景下解决农村养老短板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问题。朱震宇以全国农村互助养老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农村社区组织化的结构——过程分析框架模型”。研究发现，农村社区组织化过程由需求表达、组织机制、组织策略共同构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载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然而，马彦丽等指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数量惊人，但空壳社较多，运营较好的合作社占比不高，且合作社股权高度集中的现象没有逆转。如何促成农民合作，是实现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村庄治理有效的关键。对此，王辉和金子健研究发现，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可通过自主治理实现村庄集体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并在连带机制的作用下，将合作效益扩散，产生强化经济合作和激发治理合作的效果。

提升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是增强农产品竞争力、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董银果和钱薇雯研究发现，最低质量标准与品牌成员数量呈正U型曲线关系，而品牌成员数量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呈倒U型曲线关系。最低质量标准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随着最低质量标准由低变高，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先降低后增加。

结束语

在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指出，“十四五”规划中有关“三农”问题的阐述是“三农”发展改革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新表述、新思路、新举措，需要“三农”学者进一步探究。长期以来，中国“三农”研究滞后于发展实践、滞后于政策出台，似乎成为一种常态。回溯性、验证性研究居多，前瞻性、探索性研究偏少。目前的“三农”研究中，实证研究过多，导致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提出新理论。“三农”研究滞后于实践、滞后于政策的局面亟待改变。“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三农”理论研究和学科进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期。第一，与国外农经研究普遍不景气的情形相比，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研究蒸蒸日上。近二十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为“三农”研究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中国较好地解决了粮食安全、绝对贫困、劳动力转移等世界性难题，为全球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迫切需要上升为中国理论甚至世界理论。第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农业农村发展被放在优先位置，与之相关的前沿问题需要从理论和政策层面深入探索。

在主旨报告会上，魏后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樊胜根、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仇焕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石宝峰教授分别以“2035年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着力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碳达峰、农业绿色转型与粮食安全”、“以县域城镇化推进乡村振兴”、“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大科技信贷视角”为题作了报告。报告内容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

在论坛闭幕式上，两刊创新工程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潘劲研究员对大会进行了总结。她指出，本届论坛参会总人数达到2600多人，投稿论文和参会人数为历届之最，展现了学者们投身“三农”研究的热情。然而，论文大多囿于用过去事实检验现有理论、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模型，论文的思想性、前瞻性和创新性有待提升。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农”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求广大学者脚踏实地，将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潘劲研究员特别指出，在两刊选题中，尚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农村社会、政治、法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本届论坛大多聚焦于农村经济，实际上，农村社会、政治、法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农村观察》的重要选题。二是农村教育问题。教育决定未来。农村教育相对薄弱，相关研究匮乏，建议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开展对农村教育的研究。三是国外农业农村发展问题。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关注的选题。编辑部希望能够更多发表有关国外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高质量文章，为中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丁佳）